

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

沈 玲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持续时间最久、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非法兰克福学派莫属。国内最早介绍此学派的是徐崇温,他于1980年出版了专著《法兰克福学派述评》,此后三十多年间,关于此学派的研究一直不曾中断,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2010年12月北京师大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士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一书,该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学界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相较学界现有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论著而言,陈士部的新书有这样一些独特之处。

首先,是书有明确的“问题域”意识

从文章结构来看,都是围绕着问题谋篇布局。全书除导言与结语外共设五章。导言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酝酿、壮大与衰微过程进行了梳理。也正是在对这一学派批判理论的审视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整体脉象得以清晰显现,为后文对这一学派批判理论的阐发奠定了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起点。作者从资本逻辑的运演、西方文化传统的支撑和内部论争的张力等因素入手,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演进区分为缘起与型塑期、发展与鼎盛期和衰落与延留期。这种结合学派批判思想的历史走向并大体以时间为序的分法不同于欧力同的五时期说、俞金吾等人的地理分期说,也不同于周宪的三阶段说,既避免了以活动区间的挪移作为学派思想变化划分依据的简单化,又避免了区分过细带来的琐碎与零乱,就批判理论而言显得较为精当,也符合历史史实。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劲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就不能不回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资源。陈士部的新书首章即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批判的唯物主义”。作者认为:危机四伏的社会历史语境(“武器的批判”的诉求)与相应的理论资源(“批判的武器”的诱因)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个结论并不是凭空想像而来的,而是在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批判思想的精读与解剖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作者考察了马克思从1835年进入波恩大学到1844年写作《巴黎手稿》这10年间的思想状况,指认青年马克思“早期哲学批判是由人本主义

日益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价值判断与历史反思、理论继承与自我扬弃相统一的辩证的批判”,是“在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双向互动中趋进”,从而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黑格尔主义的解读,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是《巴黎手稿》启发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以此手稿为基础架设了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框架,其早期的批判理论与青年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批判有着较多的“天然”联系,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

厘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源流问题,挖掘二者的“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继续探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异”,并以此展开对法兰克福学派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域研究。这种思路是自然且正确的,因为正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异化理论出发的文化批判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人格心理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等文化批判主题,二者在批判实践上有着相近的精神追求。作为一个批判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消极的意义上展开的,他们对传统理论所持的一种贬黜态度也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上,并且这种批判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辩证的批判、多维度的文化批判,也是人文主义的批判。陈士部在书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意识形态批判的分析切中肯綮,显示出作者具有的良好理论素养与分析能力。

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的启发,以此为动力源与理论基础,在时代的召唤与理论的争辩中形成出了辩证中介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和美学方法等三大方法论,并与批判理论相呼应,展开了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批判,现实针对性很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一书最精彩的部分就在于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逻辑深化的论述。作者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三个方面入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展开讨论。同时,作者在书中对法兰克福学派

收稿日期:2011-09-18

作者简介:沈玲(1975-),女,江苏扬州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国古代文学,哲学美学。

中期的大众文化批判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审视,既从正面肯定了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美学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深刻影响,又指出“从反面、否定的意义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基于他们自己的艺术理想提出并论证了文化工业是消解艺术性的‘反文化’的命题”。这样的结论是作者抱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而得出的。

当霍克海默、阿多若和马尔库塞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各自的批判、否定的哲学将传统的批判理论推向极致以后,随着新一代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突起,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生了历史逻辑的扭转,相应的,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演进的研究也需要发生理论范式与问题域的转换。作者从“批判理论何以发生扭转”、“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逻辑框架与方法论特征”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维度对法兰克福学派在新时代的历史演进进行了充分论证。这样的论证分析确实是抓住了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脉络的。

作者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时代语境、策略方法和学术旨趣相联,将论述的对象限定为考察资本逻辑、思想传统和学术论争影响,从而对掣肘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历史进程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厘清了这一学派批判理论的学术轨迹。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由“批判的唯物主义”到“社会批判理论”再到“批判的社会学”的过程,这个进程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自身的逻辑进程,其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的辩证法”再到“艺术的辩证法”都是这个逻辑进程的必然性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文化历史语境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对法兰克福学派从“启蒙的辩证法”到“否定的辩证法”,最终抵达“艺术的辩证法”这一思想脉络做了一个正确的理解与解读。

其次,是书有鲜明的“批判”意识

“批判”作为一个与法兰克福学派密切相关的概念,一直贯穿在这一学派的思想理论之中。他们运用“批判”这一方法,批判法西斯暴政、批判美国极权主义,批判技术理性、技术统治,无论是“批判的唯物主义”还是“社会批判理论”,从批判政治经济学到批判意识形态、技术理性,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武器的运用都达到了轻车熟路、游刃有余的程度。该书以富于批判精神的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对象,书中也表现出作者鲜明的“批判”意识。当然,这里的“批判”是双重意义的,一面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即考察、分析和研究。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学派成员多达数十人,著述丰富,思想深广,几乎不可能在完全意义上穷尽其中某一理论家的思想,更不用说涉猎这一学派的全部成果了。这一问题也是该书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从这本书来看,作者择取了一个较好地研究维度,以近半个世纪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哲学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特征的流变为抓手,紧扣“批判的唯物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和“批判的社会学”等问题,从总体上审视与把握其流变的根由,并最终大致以时间为分期,设置研究章节,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因研究对象过丰、作者研究视域有

限的难题。

法国哲学家库辛曾经指出:“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也认为:“客观性建立在互相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的传统的基础上。”“仅靠一个空洞的头脑并不能达到客观;客观要靠批评,靠批判地讨论,靠批判地审查实验。”这就要求我们执著于追求真理,以怀疑的意识,尽可能地占有研究资料,追根溯源、竭泽而渔,客观地讨论、审查研究对象,通过扎实的研究与细致的思考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若因研究对象思想的深邃与繁多而有意只作外围的简单的历史梳理,而有意避开对其学派理论所作的理论探讨,那么一部书的研究结论在信度方面无论如何都是要打点折扣的。陈士部采用了总体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证策略,在整体观照之外,又对特定理论家或特定著作进行个案分析,书中择取法兰克福学派中像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学术成就大,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既尊重了理论发展的历史事实,又突出了一个学派理论建构方面的逻辑线索,是真正的科学的批判。同时,作者在解读一个长于批判理论的学术流派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秉持人文学者的学术良知,尽可能客观地揭示研究对象的种种特质,不夸大其词,不片面将研究对象崇高化、妖魔化,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批判。

“批判”的另一层意义是否定、反对与批评。在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研究中因为切入的视角不同,关注的侧重点的不同,学界同仁在一些观点上见仁见智。陈士部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对学界的一些现存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判”。这部新著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向前推进,作为批判理论的一种批判,作者不肯从权威,也不妄自菲薄,结论有理有据。法兰克福学派中像马尔库塞等人著作的中文译本不只一种,作者能在对不同译本的比照中,经过对文本逻辑的仔细分析发现某些中译本的误读。作者指出:“左晓斯的译文是有误的,他可能是受到下文的语意干扰,没有对该处译文细加斟酌。其实,马尔库塞的意思是在前技术时代的艺术(也就是他所说的‘肯定的文化’)给人以精神的‘净化’,使精神得以升华,而在技术理性暴虐的当今,艺术已被整合到社会严格管理的物化体制中而缺少升华的机遇。这样,郑一明的引文便以讹传讹了,不过他对引文所作的理解分析倒是很妥当的。”虽然没有对比英文版本,但从作者这里的分析来看,这个基于逻辑推演而来的结论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在一些具体问题,诸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作者也有所创见,得出的基本结论客观、有理据。比如在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时,作者既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学派用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置换了早期批判理论的实证主义批判,同时又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丧失了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风格,遁入抽象的人道主义批判的偏激中。法兰克福学派注目于科学技术的批判,

夸大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一定程度上反倒遮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游离了本真的批判对象。”再如对阿多诺的主体与客体的理想格局的批判中,作者认为:“从特定意义上说,阿多诺的美学是‘任务美学’,而绝不是修身养性的消遣美学。他是要用美学的‘边城’与技术理性的‘围城’对垒相抗。”确实,尽管阿多诺很少正面论及社会改革方向问题,但他所持的激进的批判立场使他反对任何本体论,在他看来“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性质”。正如冯宪光所言,阿多诺的美学是“救赎”美学,是“对艺术的社会学沉思”。后来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即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审美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样的例子在该书中还有不少,这里不再赘述。

再次,是书有浓郁的现实关怀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极具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学术流派,其本身就有极强的生命力。学派的批判理论是面对文化焦虑、充满悖论的时代表征展开的反思,是对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本真意义的合法性理论根基所作的诗性哲学追寻,“对当今批判理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学派成员在启蒙运动的理性反思之下对资本主义世界作出了最彻底、最完备与系统的批判。他们的批判理论既有历史纵深感,也有话语合法性,是“反抗现代性”的家族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

即便今天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已无当初的犀利与兴盛,但“它仍是后来理论想象的重要资源,是既缺席但又在场的挥之不去的幽灵”。法兰克福学派对“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作者认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有脱离具体的直接的社会实践的嫌疑,尽管它仍然拘囿于学术思辨的‘理想国’,但这或许正是它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之所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正步入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正在走进科学管理、法制管理的高度体制化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理念与方法论原则更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的精神财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影响”都是深远而广泛的。因此,作者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的深思的立足点上,对其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层面上展开的文化批判进行了进一步探析。本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在法兰克福学派广泛的社会文化主题中作者摄取了科技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人格心理批判和美学批判等四个基本文化批判主题进行了论述。不得不说,这种选择是有独到眼光的,因为这四大基本文化批判主题正是最能体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特色的理论亮点。同时,就全书的结构安排来看,作者前面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资本逻辑、文化逻辑和学术论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那

么,论述发展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美学批判理论就是行文的逻辑必然。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的一个理论流派,他们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诸种异化现实的批判,该学派的不少观点都对中国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像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反文化”的,这种思想对我们建设、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今天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书中,作者在多个方面的论述中都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当代中国意义进行了揭示。这种揭示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极富创造性与建设性的学派,它可以给我们设计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方案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美学理论提供重要的话语资源,让我们的学界在冷静的美学批判之外不忘关注社会、关注人文价值以及人的心灵与精神的诉求,同时,让我们在技术主义的时代得以警惕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对美好本真的人性的侵蚀与践踏,从而使得中国的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协调发展。而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否定的哲学也有助于国内哲学界冲破前苏联教科书式的哲学体系,以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破除以往注重政治功能的实用主义的解读模式”。

不过,此书未选择从方法论视角切入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研究,故对学派的哲学根基、理性途径、具体方法等问题未进行详尽论述,亦未能对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与当代性思潮的关联等问题展开更为深入地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者也限于篇幅未做详细论证,比如刘小枫《诗化哲学》一书认为阿多诺的美学思想和马尔库塞一样具有浓厚的本体论色彩,而陈士部却认为“刘小枫这里所说的‘他们’若要包括阿多诺在内是很勉强的,这与他们不同的辩证法观念有深层的联系(其间涉及他们的辩证法与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有着不同的关联等复杂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对之进行详细解析,有些美中不足。同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虽然有所衰落,但还是出现了第三代代表人物,虽然在具体人选上学界存有争议,比如有学者属意于阿克塞尔·霍内特,认为他“通过批判地反思前人的理论,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中的一些薄弱之处,也为批判理论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也有学者认为是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因为他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坚持社会批判理论的方向,“以批判地重续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推动西方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不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是哪一位,他们都维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都发展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历史演进的著作,作者因篇幅问题而悬置这一历史事实未作具体论述,不免让人意犹未尽。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杨年保]